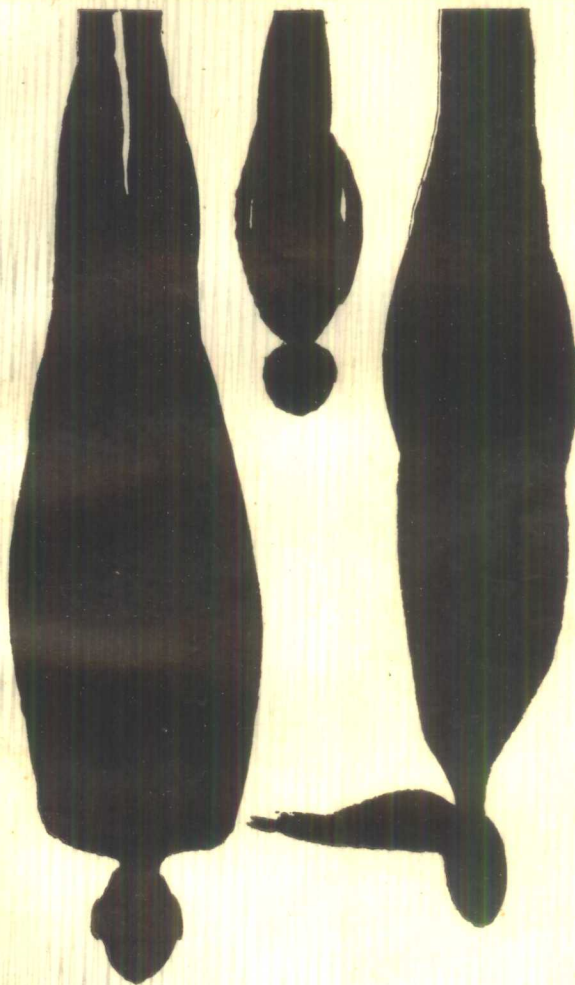


恶的本性

● 爱死和爱生
● 暴力的不同形式
● 人——狼还是羊

● 自由、决定论、选择论、宗教展望
● 乱伦关系
● 个人的和社会的自恋



▲ 陈振钦 校

▲ 薛冬 译

▲ 埃里希·弗洛姆 著

B82-054
5534

恶的本性

埃里希·弗洛姆 著
薛冬 译
陈恢钦 校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六月

Erich Fromm

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据 Harper & Row 1980年版

责任编辑：王孟兰

恶的本性

〔美〕埃里希·弗洛姆 著

薛冬译 陈恢钦校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5.125印张 99千字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ISBN 7—80016—109—9/G·59 定价：1.90元

恶 的 本 性

埃里希·弗洛姆 著

薛 冬 译 陈恢钦 校

中国妇女出版社

译 序

如果说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展示的是人的爱的能力，本书便是他着力展示人的恶的能力的一部专著。

关于人的爱，人的善恶，都是弗洛姆关于人的问题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弗洛姆在人的本性、人的自由、人的异化、人的解放诸方面，也有系统的论述，而且表现出其独特的世界观和思想，正是这些研究，使他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弗洛姆是德国出生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922年他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从事精神分析研究。纳粹上台后，他于1934年移居美国，此后，他与科·霍尼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学会，成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弗洛姆早年是弗洛伊德主义忠实的追随者，他对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的发现十分推崇，认为这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卓越贡献。但是，他又认为弗洛伊德把人的无意识本能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绝对化了，而完全忽略社会因素在人类心理学上的作用。这时，他发现了马克思。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弗洛伊德，马克思考察人是把他“同社会的、经济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

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但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也有“片面性”，马克思没有看到人的非理性力量的作用，忽视心理因素的作用。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的推崇以及对他们的理论又不能完全认同，导致弗洛姆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弗洛姆有段自述很能说明这点，“我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仍然保存的真理，而排除那些需要修正的原理；对马克思的理论，我也试图这样做。最后，我力图得出一种综合，从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解和批判中，应当得出这种综合。”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研究，贯穿于弗洛姆所有的著作中，也可以说是弗洛姆著述的特征之所在。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弗洛姆的思想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弗洛姆这部著作的前提。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弗洛姆到写本书以前的30多年里，一直是开业的精神病医生，因而，无论他对人对社会的研究都基于精神分析的基础上，由此再进行社会的历史的考察。本书中有不少关于人的性格的重要思想，如恋死、恋生、自恋、乱伦固恋，就是起始于弗洛伊德，弗洛姆又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经验，並把这些经验观察与对社会的历史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对这些思想加以“修正”，从而形成弗洛姆的独特理论。这种研究方法是严谨的、可贵的，至于结论是否正确，有哪些局限性，那要留待读者的评判了。

弗洛姆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义的发展》（1931）；《逃避自由》（1941）；《健全的社会》（1955）；《现代人及其未来》（1955）；《爱的艺术》（195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1959）；《让人占据优势》（1960）；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人为自己》(1961);
《禅宗佛教和心理分析》(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1963);《心理分析和宗教》(1967);《革命和希望》
(1968);《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1970);
《上帝与人的挑战》(1970);《对人的怀疑情绪的剖析》
(1973)等。

最后,译者要特别感谢刘福堂同志,是他的热情鼓励,
才使译者将这个小册子译出奉献给读者的。

译者

1988年7月

前 言

本书继承了我早期某些著作所提出的思想，并力图加以深化。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我论述了自由问题以及施虐狂、受虐狂和破坏性；而同时，临床经验和理论沉思使我对自由及各种侵犯和破坏性加深了理解。我能区分出对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生的各种侵犯和破坏性、恋死（它是与爱生的恋生相对立的真正爱死）的恶性形式。在《人为自己》中，我讨论了基于我们关于人的本性的知识而不是基于启示和人为法与习俗的道德规范问题。本书我要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讨论恶及善选择的本性。最后，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爱的艺术》的姊妹篇。那本书的主要论题是人的爱的能力，而本书的主要论题是人的破坏能力、自恋及乱伦固恋。然而，当对非爱的讨论达到一定程度，爱的问题也就在一种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即爱生的意义上做了讨论。我尽力表明，爱生、独立和克制自恋形成一种同爱死、乱伦共生和恶性自恋所形成的“衰亡并发症”相对立的“生长综合体”。

我对衰亡并发症的研究不仅基于临床经验，而且也根据过去多年来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这个问题不顾我们有善良意志和对核战争的后果的认识而越来越迫切，是基于避免核战争的企图同巨大的战争危险及可能性比较起来仍是无能为力

的这一事实，现实仍是核军备竞赛和冷战的继续。这种论述引导我去研究日益机械化工工业社会中对生的冷漠现象，在这个社会中，人被转变成物，其结果，如果他不是对生充满仇恨，便是对生充满了忧虑和冷漠。撇开这个不谈，当前表现在青少年犯罪以及暗杀J.F.肯尼迪总统之中的暴力情绪需要解释和理解以作为转变的当务之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走向新的野蛮（即使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条件下），我们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兴是否有可能。

因此，除了上述问题，本书的目的是要讲清楚我的精神分析学概念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关系。我从不满意我被归入精神分析的一个新“学派”，无论它叫做“文化学派”还是“新弗洛伊德主义”。我相信，许多这类新学派在发展一些有价值见解的同时，也丢掉了弗洛伊德许多最重要的发现。我确实不是“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事实上，在六十年之中没有变动的任何理论（仅凭这个事实）就不再是大师的原理论了；它只是陈腐的重复，而重复实际上是一种变形。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是以一定的哲学参照系表述的，是以本世纪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流行的机械唯物论表述的。我相信，弗洛伊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不同的哲学参照系，即辩证人道主义。我在本书中力图表明，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即俄狄浦斯情结、自恋和死本能，都受到他的哲学前提的局限，从这些局限中摆脱出来纳入一个新的参照系中后，弗洛伊德的发现会更具有说服力和更富有意义。^①我相信，那便是人道主义的参照系，是它同无情的批判、坚定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信念融合的参照系，它会使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工作得到更有成效的发展。

还有一点要说明：本书中所表达的思想都是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社会进程的研究者）的临床工作的结果，而我省略了许多临床记录材料。我打算把这些记录材料用于更厚的一本书，在那本书中将论述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治疗。

最后，我要感谢保罗·爱德华为《自由、决定论、选择论》一章所提出的批评建议。

埃里希·弗洛姆

①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精神分析的概念并不包含着要用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分析”来取代弗洛伊德学说。这种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取代通常是肤浅的，它使用从海德格尔或萨特（或胡塞尔）那里摘取的词语，而没有将其同临床事实的风格分析结合起来。这也适用于某些“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以及貌似卓越但仍很肤浅、又无真正临床基础的萨特心理学思考。萨特的存在主义如同海德格尔的一样，都不是什么新的开端，而是一个结束；他们表达了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希特勒的统治以后而产生的绝望情绪；然而也不仅是绝望情绪的表达，它们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论的表现。如果我们想一想海德格尔这样的同情纳粹主义的哲学家的话，便更容易理解这一点了。萨特更虚伪，他声称代表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是未来的哲学家；然而他仍然是他所批判的并企图改变的颓废和自私的社会精神的引导者。至于生命没有上帝赋予和保证的意义上的那种信念，许多宗教体系中都持有，特别在佛教中。然而，在其关于没有全人类都适用的客观价值的主张中，在其完全是个人主义随意性的自由概念中，萨特及其追随者丢掉了有神论和无神论宗教以及人道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封面设计：张守义

THE HEART OF MAN



ISBN 7-80016-109-9/G·59

定 价：

1.90元

目 录

(1)	译 序
(1)	前 言
(1)	一 人—狼还是羊?
(8)	二 暴力的不同形式
(21)	三 爱死和爱生
(49)	四 个人的和社会的自恋
(83)	五 乱伦关系
(104)	六 自由、决定论、选择论
(142)	《宗教展望》它的意义和目的

人——狼还是羊？

许多人相信人是羊；还有一些人相信人是狼。双方都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有力的论据。那些提出人是羊的人便举出这样的事实：人易于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即使对他们本人很有害；他们紧跟上司投入只会给他们带来毁灭的战争；他们相信各种胡言乱语，如果它是以足够的勇气提出来并得到权势者的支持的话——从牧师和君主的粗暴恫吓到神秘和半神秘的劝说者柔情绵绵的说教。大多数人好象是易受指使的半懂事的孩子，他们情愿将自己的意志任凭任何一个用足以使他们产生动摇的恫吓或甜言蜜语来讲话的人摆布。而一个有坚强信念完全可以顶住众人反对的人确实是例外，而不是规律，这一例外常常为几百年后的人所赞美，而几乎为他的同代人所嘲笑。

鉴于这样的假定（即人是温顺的），宗教法官和独裁者们建立了他们的秩序。更有甚者，正是这样一种人是羊因而需要领导者为他们做出判决的信仰，使人们由衷地确信领导者肩负着道义上的责任——即使是悲剧性的责任——如果他

们给了人们所希望的，如果他们能使人们摆脱责任和自由的重负的话。

但是如果说大多数人是羊，那为什么人的生命与羊的生命相去甚远？人的历史是用血写成的，这是一部连续暴力的历史，其中几乎有一种不可更改的力来压服他的意志。帕夏^①难道是独自消灭了几百万亚美尼亚人吗？希特勒独自灭绝了几百万犹太人吗？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们杀人，为他们行刑，这些人不仅出于情愿，而且挺高兴为他们卖命。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人对人的惨无人道比比皆是吗？——在残酷的战争中，在屠杀和洗劫中，在强者对弱者残忍的剥削中，在对受折磨的痛苦生灵的哀叹充耳不闻、心硬如铁的事实中。所有这些事实使得如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得出这样的结论：that homo homini lupus（人对人是狼）。这些事实也使我们许多人得出这样的假定，人的本性是邪恶和破坏性的，他是一个杀人凶手，他只能通过惧怕更强大的杀人凶手来节制他中意的消遣。

这两方面的论证使我们困惑莫解。的确，我们凭个人就可以知道希特勒这样冷酷无情的潜在或实际的杀人凶手和施虐狂，但这种人毕竟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人。难道我们要做这样的假定：你、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吗？我们一旦摆脱了那些至今阻止我们象野兽行动的禁锢，我们的“真实本性”便会暴露吗？这个假定既难于推翻，也难使人完全信服。日常生活为施残暴和施虐淫提供了许多机会，人们可以不用担心报复而恣意妄为。但是许多人

^①帕夏，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当今人们在日常谈话中称呼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为“帕夏”，有时含有嘲讽的意味——译者注。

并没这样做。事实上，许多人当他们遇到残暴行为时就用某种反感加以反抗。

那么，有没有对上面所说的使人困惑的矛盾说法做另一种也许是更好的解释呢？我们能不能假定说有一个简单答案，即少量的狼和大量的羊在一起生存呢？狼需要凶杀，羊需要跟从。因而狼带着羊去凶杀、谋杀、绞杀，羊依从着，不是因为喜欢这样，只因他们需要跟从。尽管那些杀人凶手必须编造出一些故事，讲他们的动机多么崇高，他们不让自由受到威胁，他们为倒在刺刀下的儿童、被强奸的妇女和被玷污的名誉报仇，以便带着大多数羊象狼一样行动。这一回答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仍留下了许多疑问。这难道不是指有两个人种——狼一般的人种和羊一般的人种吗？而且，如果说羊不是本性上要这样做，甚至于暴力是作为狼的一种神圣职责而出现的，那么，羊怎么会被说服象狼一样行动呢？我们关于狼和羊的假定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仅从大多数人所表现的来看，狼代表了人的本性的本质属性，也许，这终究是正确的？或者说，整个选择也许最终是错误的。人也许既是狼又是羊，或者二者都不是。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当前，一些国家打算使用最具破坏力的军队消灭他们的“敌人”，而且，即使他们自己在大厮杀之中有被消灭的危险，似乎也不能制止他们的行动。假如我们深信人的本性生来就有破坏的倾向，使用武力和暴力的需要也根源于此，那么，我们对不断增长的兽性的反抗也会越来越弱，假如我们都是狼，干嘛要反对狼？尽管狼和狼有所不同。

人是狼还是羊的问题仅仅是这样的问题的特殊概括，就

其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是西方神学和哲学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本质上是邪恶的和败坏的，还是本质上是善良的和可完善的呢？《旧约全书》没有认为人从根本上是败坏的。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不顺从不能认为是罪过；书中没有一处暗示过这种不顺从败坏了人。相反，这种不顺从正是人的自我意识、人的选择能力的条件，归根结底，这个不顺从的第一个举动便成为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他们的不顺从甚至似乎是上帝的安排；因为，根据先知的想法，人恰恰因为他被逐出伊甸园才得以创造自己的历史，去发挥其人的才能，并且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人达到人和自然的新的和谐，而不是他还没有成为个体人以前的那种和谐。先知的救世概念无疑含有人从根本上不是败坏的意思，他无需上帝的任何特殊恩典便可以得救。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善良意志的潜能必定成为现实。如果人作恶他会变得更恶，法老之心很“冷酷”，是因为他一直在作恶，他冷酷到不再会改变、或者不可悔改的地步。《旧约全书》起码在举出为善的例子时也举出许多作恶的例子，而且，甚至连大卫王这样崇高的人物也不被豁免于做恶者的名单。《旧约全书》认为：人有两种能力——为善和作恶——而且人必须在善和恶、祈祷和詈骂、生和死中间作出选择。即使上帝也不干涉他的选择；他派来他的使者（即先知）帮助传授使人实现善、鉴别恶、奋进和反对的标准。但这样一来，人就只剩下“两种努力”了，即为善和作恶，决定在于他自己。

基督教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基督教会发展过程中，亚当的不顺从被看作罪恶。事实上，这一罪恶如此严重，以至它败坏了人的本性，并且累及所有的子孙，因而，人凭自

己的努力永远不会摆脱这种堕落。只有上帝的恩典，为人类而死的基督的降临，才能消除人类的堕落并拯救那些信仰基督的人。

原罪说决不是在教会里无人反对的。贝拉基^①攻击了原罪说，但失败了。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内部的人文主义者即使未能直接攻击或否定原罪说（而许多异教徒当时正是这样做的），但也有助于削弱它。路德甚至可能有更过激的观点，认为人生来是邪恶和败坏的，而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启蒙时期思想家则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后者主张人的一切罪恶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因此，人不必真正去选择恶。所以他们认为，改变产生恶的环境，人的善良本性就会自然显现出来。这个观点也带有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思想的色彩。对人性善的信念是人的新的自我信赖的结果，也是文艺复兴所开创的经济政治巨大进步的结果。相反，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经过希特勒、考文垂和广岛，直到目前为宇宙毁灭作准备，这一西方道德的崩溃再次产生了对人性恶的传统强调。这一次强调，是对低估人性恶的内在潜力的强身的解毒剂，不幸的是，它却常常被用来嘲笑那些没有失去对人信任的人，有时通过误解甚至歪曲他们的观点。

我的观点往往被人们曲解为低估了人的恶的潜力，但我要强调，这种感情上的乐观主义不是我的思想基调。对一个有着长期临床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要他轻视人的破坏力量确实是很难的。在那些严重失常的病人身上，他看到这些力量的发作并体验到要遏止它们或把它们的能量输入建设性方

^①贝拉基（约354~418年以后），可能是不列颠人，基督教隐修士、神学家和异端首领——译者注。